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增订本

上

史为乐 主编
邓自欣 朱玲玲 副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增订本

上

史为乐 主编

邓自欣 朱玲玲 副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全2册 / 史为乐主编. —增订本.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1
ISBN 978 - 7 - 5203 - 0899 - 1

I. ①中… II. ①史… III. ①历史地名—中国—词典 IV. ①K928.6 - 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041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马晓光
责任校对 林福国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19.25
字数 8353 千字
定价 1980.00 元(全 2 册)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

2013-2025年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主 编 史为乐

副主编 邓自欣 朱玲玲

本书作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卫家雄	王 彬	邓自欣	申友良	田 尚	史为乐
朱玲玲	朱惠荣	华林甫	孙冬虎	杜 瑜	杨仁山
苏治光	吴郁芬	陈怀荃	陈得芝	奇文英	郑宝恒
常凤玄	崔思棣	崔恒昇	薛惠引		

项目统筹 郭沂纹 安 芳

增订本前言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后来还荣获郭沫若史学奖和首届政府图书奖，我当然感到很欣慰。这是参加本辞典编纂的全体同志二十余年不间断努力的结果，大家感到很兴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清醒地知道，我们的书中还存在很多缺点乃至错误，我从来没有陶醉过，我想得更多的是书中的缺点和不足。在各种场合和朋友谈到这部书时，我甚至更加关注大家对该书的批评意见。在书出版不久，我就有一个想法，一定要广泛搜集资料，为今后的修订工作作好准备，要把这部书改得更好，更便于读者使用。经过数年的努力，总计新增重要条目逾千条，大幅改动和调整的条目不下四五千条，改正书中的错误也不在少数，使原书有了一个新的面貌。

一 修订的第一要务就是改错

本书出版后，不断接到读者的来信，有赞扬，也有批评。批评意见讲得很具体，也很客观。最先收到的是来自广西的依兵先生的信，他对历史上壮族首领依智高的居住地“雷火峒”条目的释文提出了批评，指出此条同时有两个解释：①是“北宋置，属邕州右江道。治所在今广西大新县西北下雷镇”。②是“在今越南北部高平省之广渊县西北”（高平省后之“之”字误作“文”，乃排印之误）。前一条的引文是：“《宋史·蛮夷传》依氏又有宗旦者，知雷火。”后一条的引文则曰：“《宋史·广源州蛮依氏》：依智高“与其母奔雷火峒，其母又嫁特磨道依夏卿……（交趾）使知广源州，又以雷火、频婆四洞及思浪州附益之。”仿佛有两个雷火峒，一个在中国广西境内，一个在越南境内。而这两条释文所征引的资料看似不同，实际上都是出自《宋史·蛮夷传》的同一章节，结论也只能是一个，而不可能是两个。依兵先生是下雷人，是广西土著，“文化大革命”期间支边，回到下雷中学教历史。在下雷中学任教期间，曾对当地的历史作过一些调查研究。他在信中还介绍了几个他所了解的下雷附近的依王山寨遗址，如闷依王山寨在今下雷镇信隆村，邕倖依王城墙在仁爱村，彝依王火灶洞在智兴村。这些都是典型的依智高遗址。距下雷9公里的湖润镇坡州村有个依智高洞，1996年当地老百姓建立了纪念碑。依兵先生以史书记载为据，又有遗址为证，认为“雷火峒”释文中的第①点符合事实，应在今广西大新县西北下雷镇；而第②点则是不可信的。希望我们明辨是非，予以改正。并望我们以后增补有重要意义的“僜犹州”条目。收到依兵先生的信后，我当即写了回信，首先承认，由于我在审稿中把关不严，以致在资料引用和结论上都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特别感谢他严肃认真、有理有据的批评意见，并告诉他以后修订时，一定要作全面认真的修改，并增补颇为重要的“僜犹州”词条。按，僜犹州置于北宋，治所在今广西靖西县东。最初依智高正是在此建“大历”国的。其后由于交趾进犯，才袭据安德州（在今靖西县西北），建立了“南天国”政权。僜犹州的确很重要，这次我们修订时已予增补。

接下来又收到深圳胡昭著先生对有关“夜郎”词条的批评意见。胡先生是大学教授，喜欢搞古诗词注释。唐朝诗人李白在天宝八年（749）作有一首《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后来夜郎又是李白流放之地，因而他对历史上的夜郎甚为关注。但经胡先生查对，不仅相关古诗词中对夜郎的注释不能解决问题，就是最权威的工具书《辞海》、历史地图及几部历史地名词典、古今地名词典的注释亦有错误。因此，他给各出版社及有关作者写信，但这些信都如石沉大海，得不到任何回音。后来他便给我写信，说明其中的原委。信的最后还说：“我恳切地请求您能和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我的意见，作出处理，并书面告知在下。如在我的有生之年得到赐教，则将来我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我接到信后，对他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了查对和进一步考证，查证的结果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本辞典夜郎县④所载“唐贞观八年（634）由龙标县析置”的夜郎县，治所并不在今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西七十四里便水市（集镇名），而是在今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西南凉伞镇。与此相关联的峨山县及舞州、鹤州、业州治所的注释当然也都是错误的；夜郎县⑤所载“唐贞观十六年（642）置，为珍州治”的夜郎县，治所也不是在今贵州正安县西北，而是在贵州桐梓县北夜郎镇驻地夜郎坝。我当即给胡昭著先生写了回信，对他的意见作了肯定，说明我们在书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错误的，并表示以后在本书修订时，不仅对唐贞观八年和贞观十六年所置夜郎县治所的解释要改，与此有关的峨山县和舞州、鹤州、业州、珍州、夜郎郡等都要作相应的改动。胡先生接到我的信心异常激动，立即将这个�息捅到深圳报社。报社的记者也觉得，我这个“老专家”能坦然面对自己书中的错误，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实属难得，便要在深圳报上把我的信发表出来，打电话来问我同意不同意。我的回答很简单，要发表尽可以去发表，书中出现一些错误是正常的，特别是如此大型的�具书，稍有疏忽就会出错，更何况有些错误还不是出于疏忽，而是延续了前人的错误，是不少书上共有的。而且，有些错误是由于当时学界的认识水平就是如此，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或考古工作中有新的发现，原来的结论就会得到修正。我认为发现错误，承认错误，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能明辨是非，认识错误，实际上就是前进了一步。我不愿意强不知以为知，也不愿意强词夺理作辩解，那样做于事丝毫无补，对学术的发展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2007年12月安徽阜阳《志鉴》上发表了胡天生先生撰写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汝颖水系部分疏误摘编》一文，逐条列举了汝颖水系不少条目释文的失误。我们都认真作了研究，凡是合理的意见，一概加以采纳。此前还有辽宁义县退休干部邵恩库写的《对棘城故址初探》一文，也很有说服力，为我们修改有关条目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我院历史研究所曲英杰研究员的《史记都城考》一书出版后，嘱我为他的大作写篇书评，对于朋友的嘱托我自然乐于应承。曲先生是从研究城市史的视角来考察各个时代城市的不同类型及某些城市是如何从最早的聚落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这实际上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重新审视一下历史地名大辞典中与此有关的部分词条是否有失误和不足之处，以作为修订时的参考。结果自然是符合预期的，曲先生的书中对不少问题的研究很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关于尧都，历代典籍中一向以为“尧都平阳”，故址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今山西襄汾县（史村）东北的陶寺遗址，自1950年以来就陆续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聚落遗址及大面积墓葬区，出土有红铜铃与砷青铜齿轮形器、朱书文字以及土鼓、鼉鼓、特磬等礼乐重器。至21世纪初又发现有大规模的城墙遗迹。曲先生系统梳理了古代典籍中对尧都的记载，并结合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认定今陶寺遗址即古之尧都，这是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在修订历史地名大辞典时，我为此补写了“尧都”一条，定点即今陶寺遗址。

又如关于殷商时帝仲丁所迁的傲城。《史记·殷本纪》载：“帝中丁迁于傲。”司马贞《史记索隐》：“傲亦作噐，并音敖字。”而《尚书序》则曰：“仲丁迁于噐。”曲先生经过研究，认为河南郑州市区内的商城遗址即傲城（或称噐）之所在。又据其外郭城修筑时间较晚，及相关文献记载，推考当属周初管叔鲜所筑之管城。他指出，以噐城在今郑州市西北古荥镇北之秦敖仓城址，当属后世附会。秦时于其地置敖仓，当因敖山而得名。而仲丁所迁之地当以噐为本称，太史公写作“傲”，当属通假，而并非指此敖山为噐城之所在。这些意见无疑都是正确的，我们在修改噐或傲城条目时都采纳了，并且还增补了西周初管叔鲜所营建的“管城”一条。

又如关于周代卫国都城濮阳。濮阳本帝丘，《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前629），“卫迁于帝丘”，即此。战国时名濮阳，仍为卫都。曲先生在未掌握最新考古资料之前，根据今河南内黄县南30公里梁庄镇三杨庄西1.5公里硝河西岸沙丘上有帝善陵与颛顼陵，误以为古濮阳城（或称帝丘）亦当在其附近一带。但在他见到新的考古资料后，立即认定古之帝丘和卫都濮阳就在今濮阳县东南二十里高城村附近。秦汉魏晋时的濮阳县治所一直在此。而且秦汉时的濮阳县为东郡治，西晋咸宁间为濮阳国治，西晋末又为濮阳郡治，治所都要作相应的修改，从而解决了这一系列的问题。

兰州大学刘满教授对西北地区古地名深有研究，他的《河陇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不仅广泛搜集、悉心研究古今文献资料，而且不避山高水险，亲临现场进行实地考察，所以得出的结论往往令人不能不折服，其中对凤林津、凤林关、凤林县的研究就是一例。权威著作大多认为，凤林关在今甘肃永靖县西南炳灵寺石窟黄河南岸附近，但刘满教授通过实地考察认定，炳灵寺石窟对面的黄河南岸附近之地是一个无路可通的地方。按《水经·河水注》的记载：河水“又东北流历研川，谓之研川水，又东北注于河，谓之野亭口”。“银”即“研”之转音，研川即今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东银川河。所谓野亭口或野城口或冶城口，即银川河入河口的寺沟峡下峡口。他不仅引述了《水经注》中关于今寺沟峡的记载，而且引用了20世纪50年代冯国瑞《炳灵寺石窟勘察记》的相关内容，说明寺沟峡以下一段黄河流经峡谷之中，黄河北岸是无法东西穿行的。而且这里水流湍急，黄河南北也是无法摆渡的。所以他认定只有银川河入河口东的俺哥集（已没入刘家峡水库），才是适合津渡之处。历史上的凤林关、凤林县、凤林津只能是设在这里。加之冯国瑞《炳灵寺石窟勘察记》又指出：“俺哥集是个富有历史意义的集市，河边巨石上刻‘凤林关’三字。在古代河上是有桥梁的。”并说：“俺哥城跨河南北，遗迹犹存。”这几乎令人没有怀疑的余地。因此，在本辞典修订时，我们不仅改写了“凤林关”条，还增补了“凤林津”和北魏“凤林县”二条。

刘满教授对唐会州治所及唐代会宁关、乌兰县和乌兰关的位置的研究是对古代交通史的一大突破。关于唐会州治所会宁县的位置问题，国内一些权威著作都认为，唐会宁县治在今甘肃靖远县城关。而中国历史交通地理权威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中指出：“唐之会州当在今陡城堡地区”（即今甘肃白银市平川区水泉镇陡城堡一带）。刘满教授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紧紧抓住唐代重要典籍《元和郡县图志》关于会州州治会宁县与黄河的关键记载：“黄河堰，开元七年，河流渐逼州城，刺史安敬忠率团练兵起作，拔河水向西北流，遂免淹没。”经过实地考察，他发现今陡城堡古城所处的位置与唐会宁县的情况十分相像，最终证实唐会州州治在今白银市平川区陡城乡陡城堡古城。

与唐会州治所紧密相关的还有唐代的会宁关、乌兰县和乌兰关的位置问题，因为《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书都记载了会州与会宁关、乌兰县和乌兰关之间的方位、里数，所以唐会州治所会宁县位置的确定，对于考定这几个地名的位置关系很大。国内一些权威著作因

为将会州治所定在今甘肃靖远县城关，加上历来对文献中记载的会州与会宁关、乌兰县和乌兰关等地的方位理解有误，所以做出了一连串的错误结论，将会宁关、乌兰县和乌兰关定在今甘肃靖远县西南七八十里、远离黄河的高山上。而严耕望先生明确指出，乌兰关与会宁关“度其今地当在景泰县地区，黄河大弯曲处。乌兰县关盖在景泰县治东不远，会宁关则在河之东岸也”。而且说：“会宁、乌兰两关相距四里，夹岸并置，中为津渡也。”（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册，第415页）正是因为严先生提出了在今景泰县地区黄河大弯曲处这一说法，纠正了当代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失误，刘满教授才得以提出唐会宁关在今甘肃靖远县北双龙乡仁和村的北城滩村古城遗址一说，而且提出了关于乌兰县和乌兰关位置的新说。刘教授在严耕望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的探讨，并经过实地考察，认定乌兰县和乌兰关在今景泰县东五佛乡沿寺东南黄河转弯处。而据《太平寰宇记》卷37“会州”条的记载，乌兰县和乌兰关应在“会宁关西南四里”。历史上的一则错案终于获得解决。为此，我们这次对辞典的修订，不仅改写了会州、会宁县、乌兰县、乌兰关及与之有关的会宁防、会宁镇、西会州、粟州、会宁郡所处的地理位置，还增补了“乌兰津”一条。

关于大震关，有的说在今陕西陇县西北陇山东坡，又有的说在今甘肃清水县东五十里陇山西坡，甚至还有有的将这两种说法兼收并蓄加以调和。刘满教授在《大震关考辨》一文中对不同说法的由来进行了认真的梳理，指出大震关在陕西陇县西一说见于《后汉书》李贤注和《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都属早期记载，比较可信；而大震关在甘肃清水县东境之说则出于欧阳修的《新唐书·地理志》，成书较晚，不足信。而《方輿纪要》、《清一统志》等书依违两端，对以上二说加以调和，也不足取。他在辨《新唐书·地理志》大震关之误时，还根据《旧唐书·宣宗纪》的记载指出，唐大中六年（852）陇州防御使薛逵主持大震关迁徙时，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讲得很清楚：故关位于“汧源西境”。汧源县治所正是今陕西陇县。薛逵当时任陇州防御使、秦州刺史、天雄军使。兼秦、成两州经略使，而且又任陇州刺史，他对秦、陇二州的情况，当地的关防屯戍等要害之地应当是非常清楚的。《唐会要》中还收录了薛逵主持大震关迁徙时的奏章，说到“谨画图进上”。而皇帝的敕旨中也说：“薛逵新置关城，得其要害，形于图画，颇见公忠，宜依所奏。”这些都是当时的第一手资料。应当是最有说服力的。所以对于“大震关”条，我们也根据刘满教授的意见作了修改。

再如，关于唐临潭县及洮州故址的研究也是一个长期困扰人的问题。唐代的临潭县，旧为洮阳城。北周时于此置美相县，并置洮州治此。隋大业间改洮州为临洮郡，唐初复改为洮州，后又改为临洮郡。著名的《哥舒歌》中“至今窥胡马，不敢过临洮”，指的就是这个地方。但唐临潭县故城究竟在何处？有些权威著作如《中国历史地图集》，一些地名辞典或历史地名辞典，还有新《辞海》等，都认为在今甘肃临潭县。本辞典虽然点明了隋唐洮州、临洮郡治所美相县所在的洮阳城在“今甘肃卓尼县西洮河南岸”，但又加了一句“一说即今甘肃临潭县”，仍让人无所适从。为什么会这样？这说明我们对唐临潭故城只有一知半解，还缺乏真正的了解。刘满教授研究学问有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他先查阅《水经注》，见其中《河水注》有“洮水又东流径洮阳曾城北”的记载，并不囿于“水北为阳”的惯例，坚信《水经注》的记载是真实的。又查《元和郡县图志》，卷39记载北周保定元年（561）置于洮阳城的美相县“其城东、西、北三面并枕洮水”，同样说明故城在洮水之南。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一直在苦苦搜寻，没有答案，就是这个故城究竟在何处？后来他在甘肃省博物馆一个内部刊物《陇右文博》1999年第2期上，看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的樊维华写的《〈八棱碑〉与唐洮州临洮郡》一文，考定唐洮州治所在今甘肃卓尼县卡车乡的羊巴古城。此文不仅否定了地处洮水北十余里

的临潭县故城说，也将唐临潭县城在洮水南岸的说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确定无疑地告诉我们，唐临潭县和洮州故城就在羊巴古城。这个结论与《元和志》记载的唐临潭县“东、西、北三面并枕洮水”的地形特点完全相符，而且城内所出《八棱碑》，其所刊文字直接证明了羊巴城即唐之临洮郡城。这样，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最后刘满先生写出《唐洮州治所位置考》一文。我们根据刘满先生考证的结果，对唐临潭县及其有关的洮阳县、美相县、洮州、洮阳都、临洮郡等条一一进行了修改，有的甚至重写。

此外，我们这次修订，还参考了商务印书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已出版的各省市分册及5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中国名胜词典》精编本；文物出版社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介汇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六批）精编本》及《中国文物旅游图册》、《中国文化遗产词典》等。特别是商务印书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以下称新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最为突出。这两部书都有不少地名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撰写的重要词条，而且有不少词条是由各省市地名研究机构提供初稿，最后由专家定稿的。这样就使得这些词条的释文更加切合实际，内容更加准确，因而也更有参考价值。

如“井陘关”，又名“土门关”，我们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原来的定点是：“在今河北井陘县北井陘山上。”这是错误的。其实，井陘关不仅又称土门关，还有井陘口、土门口之名。新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井陘口”条说：“即今河北省鹿泉市西南东土门。”为河北太行山井陘东西交通要隘东口。这是有历史文献记载为依据的。《元和郡县图志》卷17“恒州获鹿县”条载：“井陘口，今名土门口，县西南十里。即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获鹿县正是今之鹿泉市。据此我们不仅修改了“井陘关”和“土门关”释文中的错误，还增补了“井陘口”、“土门口”二条。

又如安徽境内的西关和七宝山，这是三国时曹操与孙权对峙之地。我们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写的是：西关①“故址在今安徽巢湖市东南三十里七宝山上。三国魏筑，与东关相对峙”。又，七宝山①“在今安徽巢湖市东南三十里，与无为县交界”。西关、七宝山在巢湖市东南三十里是不错的，但是这些地方并不属巢湖市，释文中所说“与无为县交界”也不准确，不是“与无为县交界”，而是属无为县地。新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无“西关”词条，但有“七宝山”，释文曰：七宝山“在今安徽省无为县东北，接含山县界。三国魏于此筑西关，隔濡须水与吴所筑濡须山上东关相对”。两相对比，我们吸取了新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的长处，改正了本辞典的错误，将“七宝山”的释文改为：“在今安徽巢湖市东南三十里，无为县东北、接含山县界。”又将“西关”的释文改为：“故址在今安徽巢湖市东南三十里，无为县东北、接含山县界的七宝山上。三国魏筑，与东关相对峙。”这样便使七宝山和西关的地理位置与隶属关系显得更加明白。

又如，清顺治十八年（1661）十二月，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曾设天兴、万年二县，属承天府。以天兴县管辖台湾北部地区，以万年县管辖台湾南部地区。清康熙三年（1664）郑成功子郑经改置天兴、万年二州，属东宁府。这些行政建置，在台湾历史上无疑都至关重要。我们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对这两处行政建置治所的定点，原是根据20世纪50年代初期，台湾某些地方史志的说法，将天兴县和天兴州的治所定在“新港（今台南县南新市乡或新化镇）”；将万年县和万年州的治所定在“二赞行（今台南县南仁德乡二行村）”。这些都不够准确。这次修订，参照新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都作了修改，将天兴县和天兴州的治所定在“佳里兴（今台南市台南区西南佳里镇北佳里兴）”；将万年县与万年州的治所定在“兴隆里（今高雄市

北左营区凤山县旧治)”，以求更加准确。

还有《后汉书·东夷传》中即载有“夷洲”。《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黄龙二年(230)，“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但得夷洲数千人还”。对夷洲也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意见认为，夷洲“即今台湾省本岛”，隋时改称流求。这可以说是当今海峡两岸学者的共识。另一种意见认为，夷洲“即今琉球群岛”，此说虽然也是出自一位台湾著名史家的论断，但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我们这次修订，亦依新编《古今地名大词典》的说法，对夷洲的解释改为：“即今台湾省本岛。自汉至南朝见有此称。隋时改称流求。”

此外，我们还根据周振鹤教授《西汉政区地理》的研究、考证，并参照新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的有关释文，对汉代某些郡国的置废进行了必要的修改，以求与实际情况相吻合。东汉时期部分郡国的调整，则参照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进行了修改。对于西南地区唐宋时期部分羁縻府州的地望和治所不准确处，我们参考暨南大学郭声波教授的有关论著，作了适当的调整和修改。

《历史地理》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权威刊物，近年每期都有不少很有分量的好文章，诸如李晓杰的《战国秦县新考》(《历史地理》第22辑)、郑威的《西汉东海郡的辖域变迁与城邑分布》(《历史地理》第25辑)、林汀水的《福建政区沿革治所考》(《历史地理》第24辑)及张修桂先生对《水经·江水注》和《水经·沔水注》某些河段的“校注与复原”(《历史地理》第23、24、25辑)等，都为我们这次修订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由于近年来湘西龙山县里耶遗址战国秦简的发现及学界对秦代封泥研究的深入，原来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述的汉代设置的郡县，有一部分被认定是战国或秦设置。对于这些简牍与封泥中一些文字清晰、解读又无歧义的地名，我们这次修订时拟予采纳，对有关条目的释文中加以调整和更正。

至于新增补的大量词条，主要是根据考古新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是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有关文献资料，并参考了文物出版社出版、由丘富科编著的《中国文物旅游图册》和丘富科主编的《中国文化遗产词典》。凡发现有与历史情况不符的，则必查阅有关历史典籍或古今地志，以求有一个比较满意的结论。此外，还参考《辞源》的地名类条目，补写及修改词条六十余条。以前研究历史地名很少借助《辞源》，实则《辞源》对于历史地名条目的设置及解释都有独到之处，对研究历史地理大有裨益。其后，借助于《辞源》对地名类条目的修订，对部分地名条目又作了一些增补和修改。后来又借助于施和金编撰的《北齐地理志》(2008年6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增补了大量北齐的州、郡、县条目，并对其他一些相关条目进行了必要的修改。但由于该书对北齐政区注明今地时，疏于考证，失误过多，故我们对所有增补条目的今地全部重新考定。

二 关于增补新词条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修改有错误的词条时，常常会发现遗漏或需要增补的词条，一般都是随发现随增补，但这些毕竟仅占极少一部分。而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和科学研究的深入，不断会有新的成果涌现，出现一些新词条是常有的事。

1. 关于考古新发现

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元氏县西张村发现的西周墓中，出土青铜器臣谏簋内底铭文记载了“惟戎大出于軹，并(邢)侯搏戎”的历史事实，证实軹国故址就在今元氏县西张村一带。《荀

子·成相篇》就说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尚书序》正义引《世本》亦曰：“昭明居砥石。”旧时不知砥石所在，后来有学者认为就在今河北泚水附近。直到在今元氏县南古泚水（今槐河）一带发现軹国故址，軹、泚、砥三字同音通假，证实軹就是昭明所居的砥石所在，也就是说这里就是商族早期的活动中心。我们今天将“軹”确定为新增词条，是完全应该的。而原书中又漏收了“砥石”条，因此这次一并补入，也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曹操墓，因为近年不断被盗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8年12月至2009年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其实在我们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本来已经收了曹操墓，而且有二条，但都不是以“曹操墓”的名义收入。它们都是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的资料撰写的，一条名为“高平陵”，作为主条，指出：“亦称高陵。俗称西陵。即曹操墓。在今河北临漳县邺镇西南。”另一条名为“高陵”，作为副条，指出：“即高平陵。亦即曹操陵墓。在今河北临漳县邺镇西南。”这次的考古发掘，才真正弄清了曹操墓的具体位置，即“今河南安阳市西北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2号大墓”。因此这次修订又补写了“曹操墓”一条，在释文中增加了曹操的生平及该墓发掘的一些情况。并介绍了出土随葬物品中有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柝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柝虎短矛”铭文及一件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铭文的石枕，所有这些都为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这样做也许能为读者了解曹操墓及曹操带来一些方便。

又如，近来“秦东陵”的盗墓事件在社会上也搅得沸沸扬扬，一般人可能连秦东陵在什么地方都不清楚。其实，秦东陵就在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骊山西麓，相对于雍城（今陕西凤翔一带）的秦西陵在东方，故称秦东陵。以前只知道秦东陵的大体方位，1986年在临潼区韩峪乡范家村，当地农民修水渠时发现秦始皇先祖的陵园，其后发现陵园内有明显暴露的墓葬五处，陪葬坑两处。经探察，其中两座大型墓葬有三十多个陪葬墓。在两座大型墓葬中，北侧的一座呈十字型墓葬，初步推断是秦始皇父母庄襄王与赵姬的合葬墓。这些陵园附近还出土了大批重要文物。2006年秦东陵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样一处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历史遗址，当然在我们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应予增补之列。

此外，如河南永城市北芒砀山的“汉梁王墓群”，江苏徐州市及铜山区境内的“汉楚王墓群”（又称“楚王山汉墓群”），河北定州市境内的“汉中山王墓”，浙江绍兴市的“印山越国王陵”，新疆“哈密回王墓”和莎车县东的“叶儿羌汗国王陵”等，1996年以来先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这类重要遗址作为新词目增补进来是完全应该的。

2. 重要文物古迹

有一些文物古迹，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如在今湖南衡阳市南岳镇北街的南岳庙，又名南岳大庙、圣帝庙。是我国南方现存规模最大的宫殿式古建筑群。规模宏大，与泰山岱庙、登封中岳庙并称于世。2006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又如在今青海玉树县城东南五十里巴塘乡贝纳沟内的“文成公主庙”，又称“贝大日如来佛石窟寺”，是一座独立的藏式平顶建筑。相传唐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进藏经此时曾短暂停留，教当地藏民耕种、纺织，藏民便在石壁上造像修庙以示纪念。2006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汉藏人民友谊的象征。

又如在今河南巩义市东北十六里大力山下、地处伊洛河北岸的“巩县石窟”。此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及北宋相继在此凿窟造像。1982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项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自然不用多说，而且就其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时间来说，本来是我们在《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应当收入的，之所

以没收，是属于漏收，这次修订就更应该补收了。

此外，如在今北京市房山区西北三盆山的“十字寺遗址”，在今福建长乐市塔坪山上的“圣寿宝塔”，在今山东济宁市小闸口古运河西岸的“东大寺”和在今河南开封市顺河回族区的“东大寺”，在今湖北钟祥市区南隅的“元佑宫”，在今陕西周至县城中心的“八云塔”（又称瑞光寺塔），陕西佳县城南十里白云山上的“白云山庙”，在今云南姚安县北二十四里龙华山麓的“龙华寺”，云南大姚县西宝筏山顶的“大姚白塔”，在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西的“七个星佛寺遗址”等，这类历史价值很高、并在1996年以后先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迹，都应增补。

3. 著名的建筑物

说到古建筑，首先要提的是在一些名山胜地的古建筑群，如“泰山古建筑群”、“五台山古建筑群”、“峨眉山古建筑群”、“武当山古建筑群”等。如今这些地方不仅先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讲到有地方特色的古建筑，首先要说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南宗科乡的“日斯满巴碉房”，是一处典型的藏族传统民居碉房。日斯满巴碉房是迄今发现的四川省乃至全国年代最久、规模最大、层数最多、建筑最高的藏族传统民居建筑，被誉为“藏族民房之王”。2006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还有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梭坡、中路、蒲角顶等处的“丹巴古碉群”，也是中国古建筑遗产和世界古建筑杰作之一。其建筑艺术精湛绝妙。2006年也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另有一种客家民居土楼建筑，最有名的要数福建华安县东北仙都镇的“二宜楼”，是福建土楼中不可多得的珍品。1996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二宜楼外，福建客家土楼民居可以说遍及全省，而以龙岩、漳州地区为多。福建土楼的产生可追溯至宋元以前。现存的土楼一般为明清以后所建。土楼类型常见的有圆楼、方楼、五凤楼（府第式）、宫殿式楼等。2001年福建土楼（与二宜楼合并）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今安徽黟县东十五里有“西递村古建筑群”，在黟县东北二十里有“宏村古建筑群”，2000年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次年又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还有在今山西祁县东北二十里乔家堡村的“乔家大院”和今山西灵石县东北静升镇的“王家大院”，一个是由商业资本家乔致庸祖孙几代人营建的家园，成为清代北方民居的典型代表；一个是由清乾隆年间一个官宦之家、兼营商业的王氏家族营建百余年的家园，有“中华民居第一宅”之称，两个大院分别在2001年和2006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还有一大批著名的中外近代建筑，包括“大连俄国建筑”、“大连中山广场近代建筑群”、“青岛德国建筑”、“青岛八大关近代建筑”、“上海外滩建筑群”、“广州沙面建筑群”、“北海近代建筑”（广西）、“北戴河近代建筑群”等，1996年以来先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不少地方都成了世界建筑博览会，对于研究世界建筑史、帝国主义侵华史大有裨益。这类词目我们也有选择地增补了一些。

4. 近现代革命遗址

近代革命遗址，最重要的莫过于在今广州市纺织路东沙街的“广州大元帅府旧址”。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护法军政府。9月1日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这里就是大元帅孙中山的帅府。1996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还有在今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23号的“孙中山行馆”。1921年孙中山组建中华民国

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带病赴北京讨论国事，发出对内召开国民会议、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号召，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展开斗争，临时寓居于此，直至1925年3月12日病逝。2006年也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代革命遗址，有土地革命时期海南省海口市振东区解放西路竹林里131号院“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1926.6）。抗日战争时期有：在今山西左权县城西南河头村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1937.11—1939.6），在今山东莒南县北大店镇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旧址”（1941.3—1945.9），在今山西潞城市城西山麓浊漳河畔北村的“八路军司令部北村旧址”（1938—1939），在今河南洛阳市老城南关贴廓巷51、52号院的“八路军洛阳办事处旧址”（1938.11—1942.2），在今广西桂林市中山北路96号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1938）。解放战争时期有：在今河北武安市西南冶陶村的“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旧址”（1946—1948），在今湖北大悟县东北宣化店的“中原军区旧址”（1946），在今江苏南京市汉府街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办事处旧址（梅园新村）”（1946—1947）等。这些现代革命遗址，在1996年至2006年，都先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 古今名人故居

名人故居很多，向来也备受关注。这里仅将1996年以来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者，选一部分列举于下：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有“北京鲁迅故居”，辽宁省沈阳市区有“张学良故居”（张大帅府），江苏江阴市南旻岐村有“徐霞客故居及晴山堂石刻”，太仓市有明末文学家“张溥宅第”，常州市内有革命烈士“瞿秋白故居”，安徽肥西县西七十四里刘老圩有出任台湾首任巡抚的“刘铭传故居”，浙江余姚市龙泉山有“王守仁故居”，绍兴市有“大通学堂和徐锡麟故居”及“蔡元培故居”，海宁市盐官镇有“王国维故居”，奉化市溪口镇有“蒋氏故居”，山东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有《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故居”，河南嵩县东北三十里程村有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的“两程故里”，湖南浏阳市内有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故居”等。

此外，广西钦州市有清末抗法名将“冯子材旧居建筑群”和“刘永福旧居建筑群”等。凡是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人故居或名人墓葬，我们尽量收录。

以上所举各个方面应增补的词条，只是新增词条的一部分，重要考古遗址、古城市遗址，重要文物古迹等还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凡有重要价值的，一定要增补。这些词条绝大多数都属于人文方面，增补这类词条，也正符合一些专家学者反映的多增加一些人文方面的内容的期待，使用起来可以更方便些。

三 随着行政区的调整，释文中的“今地”也须作相应的改动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出版于2005年3月，按说时间并不长，但由于最后定稿阶段确定的行政区划断限（即“今地”所指的时间）为1994年年底，至今已有十六七年之久。这次修订要把行政区划的时间断限后移16年，定在2010年底。在这16年之中，我国行政区划的变化实在太大了。1994年，重庆市还作为省辖市留在四川省内。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复设重庆直辖市，管辖原属四川省的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改置万州区和涪陵区；另设万州移民开发区和黔江开发区。万州移民开发区代管巫山、巫溪、奉节、云阳、开县、忠县6县；黔江开发区代管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族自治县等5自治县。2001年撤销

万州移民开发区和黔江开发区，代管各县由重庆市直辖；同时撤销和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设立黔江区。次年改长寿县为长寿区；其后江津、合川、永川、南川4市分别改为市辖区。至今重庆市共辖19市辖区、17县和4个自治县。

如今北京市辖14市辖区、2县；天津市辖13市辖区、3县；上海市辖17市辖区、1县。这些市辖区、县有些是沿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市辖区或县，有些是由以前的县市改置，也有的是新设或由省并而来。因为在这些直辖市范围内，历史上的一切行政建置，都要以今天的市辖区或县说明其相对地理位置，故不得不把这些市辖区或县的由来及其变化交代清楚。

还有一种市辖区是地级市市辖区（相当于县级），为数也不少。如南京市辖11区、2县，广州市辖10区、2市。当然，南京、广州本来就是大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一段时间内都曾是中国直辖市，一般城市是无法相比的。而有一些城市本来可能仅仅是个小小的村镇，但随着新兴工业的发展，一跃而为地级市。如山东的东营，原为垦利县的一个集镇，因附近盛产石油，1986年改设地级东营市。现辖2区、3县。又如黑龙江的萨尔图（或作萨勒图），1965年地级安达市迁治于此，即成为地级市。1979年改名大庆市。现辖5区、3县、1自治县。

最近16年的行政区划变化更大。如1995年，广西贵港市升格为地级市；湖北黄州市因撤销黄冈地区改设地级黄冈市，湖南永州市因撤销零陵地区改设地级永州市，四川涪陵市因撤销涪陵地区改设地级涪陵市（1997年涪陵市划归重庆市，改为涪陵区）。

1996年，江苏泰州市和宿迁市均升格为地级市；河北衡水市、安徽阜阳市、福建龙岩市、四川宜宾市、陕西汉中市和延安市，均因撤销地区改为地级市。

1997年，山东聊城市、河南商丘市、湖南怀化市、广西玉林市、贵州遵义市、云南曲靖市和玉溪市，均因撤销地区改设地级市。

1998年，安徽宿州市、江西赣州市、河南信阳市、湖北咸宁市、四川广安县、宁夏吴忠市，均因撤销地区改设地级市。

1999年，内蒙古撤销哲里木盟改设地级通辽市；山西榆次市因撤销晋中地区改设地级晋中市。黑龙江绥化市、安徽巢湖市和六安市、陕西榆林市，均因撤销地区改设地级市。

2000年，安徽亳州市和湖北随州市均升格为地级市；安徽宣州市因撤销宣城地区改设地级宣城市；江西临川市因撤销抚州地区改设地级抚州市。山西运城市、忻州市和临汾市，浙江丽水市，安徽池州市，江西吉安市、宜春市和上饶市，山东滨州市和菏泽市，河南周口市和驻马店市，四川雅安市、巴中市、资阳市和眉山县，贵州安顺市，云南保山市，陕西安康市，均因撤销地区改设地级市。

2001年，内蒙古撤销伊克昭盟，改设地级鄂尔多斯市；撤销呼伦贝尔盟，改设地级呼伦贝尔市。陕西商州市因撤销商洛地区，改设地级商洛市。云南昭通市、甘肃武威市、宁夏固原县均因撤销地区改设地级市。

2002年，甘肃西峰市因撤销庆阳地区，改设地级庆阳市。广西百色市、河池市、贺县（1997年改贺州市）、来宾县、崇左县，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甘肃张掖市、平凉市和酒泉市，均因撤销地区改设地级市。

2003年，内蒙古撤销巴彦淖尔盟，改设地级巴彦淖尔市；撤销乌兰察布盟，改设乌兰察布市。宁夏中卫县改设地级中卫市。山西离石市因撤销吕梁地区，改设地级吕梁市。云南思茅市因撤销思茅地区，改设地级思茅市（2007年改名普洱市）。云南临沧县、甘肃定西县，均因撤销地区改设地级市。

2004年，甘肃武都县因撤销陇南地区，改设地级陇南市。

在此期间，还有不少县改为县级市，也有一些县改为地级市的市辖区，市辖区也在不断进行调整。因此，地级市辖有若干市辖区及县市也成为比较普遍的问题，某些县级市（包括某些县）如何变为地级市在辞典中相关部分也要有所交代。如山西的地级吕梁市，是2003年由吕梁地区和县级离石市改置，而离石市则是1996年由离石县改置。这样我们只要在“离石县”条下交代一下“1996年改设离石市。2003年撤销吕梁地区和县级离石市，改设地级吕梁市。原县级离石市改置离石区”即可。又如，临沧县改设地级临沧市也是在2003年。按理说，要在“临沧县”条交代一下，但是我们这部辞典是历史地名辞典，收词时间断限仅至1949年9月底止，而临沧县却是1954年改缅甸县置，本辞典并没有“临沧县”词条，我们要想说明临沧县改设地级临沧市的情况，只好在“缅甸县”条加以交代。

这样在适当的条目中交代一下后来改设地级市的情况固然方便，但要查起来却不容易，不知道到哪里去查。为此我们特编写了一份《中央直辖市及现有地级市1949年前后地名对照表》附于书后。为节省篇幅，仅将1949年前后地名不同的收入其中。读者依此表中的古旧地名可查对相应的中央直辖市和地级市的历史变化。

1995年以后，除了行政区划方面的变化以外，国家文物局先后于1996年、2001年和2006年公布了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个别词条可能原来已收入本书，但由于当时掌握的资料不够充分，再版时需要作一些修改；而大量原来没有收入本书的词条，则需根据情况加以增补。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专门作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1987年以后，中国的一些著名历史名胜和文物古迹，如泰山、明清故宫、秦始皇陵、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长城和莫高窟等，先后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前在本书中没有介绍过这方面的情况，这次修订时都增加了必要的说明。

顺便还要说一下，这次专门介绍了行政区划的调整，在有关古地名释以今地时也作了相应的改动。牵涉到邻国地名时，凡与今情况不符的，也都作了修改。特别是有关越南的地名，由于以前使用的越南地图大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数十年来越南行政区划调整也很大，因此对有关古旧地名的今释绝大多数也都根据越南最新地图作了相应的改动。

还有，考虑到数十年来，乡、镇地名的变化甚大，这是一个基层政区不断调整的问题。辞典中在注明今地时，有些本为乡、镇的地名，如今有的变为地级市的区，或重要街道名称，也有的在今天的地图上已经消失，还有不少在隶属关系方面发生了变化。凡此种种，若不对原来括注的今地加以改写，就会令人不知所云。但若一一改成今日的地名，难度着实很大，特别是那些在今日的地图上已经消失的乡、镇地名，要给它定位相当难，为此笔者搜集了几十年来不同时期的各种地图、各种辞典以及其他文献资料，包括新编的地方志书，不避麻烦，终于把这些地名基本搞清楚。笔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此类改动在本书中足有三千条。笔者相信，通过这样的修改，定会给读者提供方便。

前不久，笔者去台湾时购得一张《台湾行政全图》，对我们正在修订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大有裨益。因对有些地方的区划调整不够明白，笔者曾致函台南市和花莲县政府询问，都得到热情的回复和解答。但由于近几年台湾的行政区划调整幅度很大，有新市的设置、撤县改市、撤县并市以及辖区的调整等等，有些问题着实难以弄清楚。后来看到台湾近年“行政区划”调整资料，对一些政区调整的时间基本上可以弄清楚，至于所处方位及其定点，大体上也可以掌握，在修改词条时尽量做到准确无误，这是我们一贯的原则，自然要尽力做好。

四 增加字头笔画索引

鉴于某些汉字笔画的多少在有些工具书中有出入，书写时笔顺的先后也多有不同，因此有些读者强烈要求增加音序索引。但编制音序索引确有困难，我们只能编制字头笔画索引，为读者提供一定的方便。比如，在我国江浙一带，有些古地名有古越语的残留，如“句吴”、“於越”等。“句”有 jù [巨]、gōu [勾] 二音。《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司马贞《史记索隐》引颜师古注《汉书》，说是“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音，犹言‘於越’耳”。“於”亦有二音，一音 yú [于]，另一音 wū [乌]。《春秋》：定公五年（前 505），“於越入吴”。又《春秋》：定公十四年（前 596），“於越败吴于檇李”。据《左传》杜预注：“於，发声也。”证明此与“句吴”的“句”意思相同，亦吴越语之发声。

又如“叶”，亦有二音，一为 yè [夜]，又为姓氏。今河南有叶县。而叶之古音为 shè [摄]。

春秋时楚有叶邑，在今河南叶县南二十八里旧县。《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注，司马贞《史记索隐》：“叶音摄，县名，属南阳。”《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叶县下原注：“楚叶公邑”即是。刘向《新序·杂说》载有“叶公好龙”故事，源出于此。

又如“覃”，亦为姓氏，有 tán [谈]、qín [秦] 二音。《通志·氏族略二》载：“覃氏，本谭，或去言为覃。梁有东宁州刺史覃无克。又音寻，今岭南多此姓焉。”壮族姓氏覃皆读 qín [秦]，因姓氏而得名的地名亦读 qín [秦]。今广东吴川市有覃塘镇，广西贵港市西北有覃塘镇，即是。

地名中带有“乐”字词头的词条有三音，一音 yuè [月]。今浙江有乐清市，是因古时的乐正（乐师）而得名。一音 lè [勒]。汉有乐陵县，属平原郡。治所在今山东乐陵市东南二十五里花园镇城子后。东汉为乐陵郡治。据《汉书·地理志》注，颜师古曰：“乐音来各反。”今乐陵县读音仍不变。汉元封间又置乐浪郡，治朝鲜县。在今朝鲜平壤市大同江南岸土城垆，或说即今平壤市。据《汉书·地理志》注，颜师古曰：“乐音洛。浪音狼。”还有一音 lào [涝]，河北唐山市有乐亭县，为李大钊之故乡。

又如“费”，亦有二音。一音 fèi [废]。今山东有费县。春秋时鲁有费邑，在今山东鱼台县西南（鱼城西南）。《左传》：隐公元年（前 722），“费伯帅师城郎”。杜预注：“费伯，鲁大夫。”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费，“《汇纂》：鲁大夫费彦父之食邑。读如字，与季氏费邑读如秘者有别。魏武封费亭侯，即此。今鱼台县西南有费亭”。而费之古音则为 bì [必]。春秋时另一费邑在今山东费县西北二十里。《左传》：僖公元年（前 659），“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襄公七年）夏，城费。”颜师古注：“费，鲁邑也。音秘。”

又如“栎”，亦有二音。一为 lì [历]。春秋时有栎邑，在今河南禹州市。《春秋》：桓公十五年（前 697），“秋九月，郑伯突入于栎”。杜预注：“栎，郑别都也，在今河南阳翟县……栎音历。”而战国时秦所置栎阳县，在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东北渭河北岸，音 yuè [月]。秦献公曾徙都于此，西汉高帝亦曾以此为都。《史记·货殖列传》：“献（孝）公徙栎邑。”司马贞《史记索隐》：“上音药，即栎阳。”

又如“尉”，亦有二音。一音 wèi [卫]。此为今常见读音。尉古为官名，多为武职。春秋时郑有尉氏邑，战国秦置尉氏县，治所即今河南尉氏县。《汉书·地理志》注引应劭曰：“古狄官曰尉氏，郑之别狄也。”臣瓚曰：“郑大夫尉氏之邑，故遂以为邑。”颜师古曰：“郑大夫尉氏